

岑参的西域行旅与“丝路”之作

杨晓霭¹ 高震²

(1. 兰州理工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2.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盛唐边塞诗人岑参,以其先后两次入幕边地的亲身经历进行“丝路”创作。留存至今的约78首“丝路”之作真实反映了西域风光,歌颂了异域人情,极大拓展丰富了边塞诗的表现内涵。在诗歌体裁上继承发扬七言歌行、绝句的音乐性,尤其在边塞诗作中对七言歌行体的探索与运用,创立“……歌/行,(奉)送……”的歌行新体式,实现了对边塞体裁的创新。同时“丝路”之作所呈现的奇丽悲壮风格体现在对优美、崇高这两个美学范畴的并力探索,进一步促成岑诗的多样风格。针对近年来文学与地域、文化与地理相互作用的研究,岑参西域行旅与“丝路”之作不失为一较好的切入点;通过其“丝路”创作的考察,亦可对“盛唐气象”下的“丝绸之路”有一新认识。

关键词:岑参;西域行旅“丝路”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2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14)05-0010-06

收稿日期: 2014-08-26

作者简介:杨晓霭(1962-),女,甘肃秦安人,文学博士,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研究;高震(1989-),男,山西大同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塞诗这一题材自其产生就品评不断;而唐代边塞诗歌更是历来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特征愈为明显。^① 检阅盛唐边塞诗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高适、岑参边塞诗创作的研究探讨可谓首屈一指,这一现象的形成亦反映出高、岑边塞诗的创作水平。“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在同时代诗人杜甫笔下首次将高岑并称。“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1] P181} 相同的入幕经历与相近的创作风格使得高岑并称,进而演绎出“边塞诗派”这一诗歌流派。尽管“边塞诗派”这一说法颇存争议,^②然争论正体现出高、岑边塞诗创作的影响深远。“边塞诗派”之说虽有争议,但是诗人的边地之行、边塞之作却是客观存在、不容质疑的事实,更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盛唐边塞诗歌创作的繁荣无疑体现着“盛唐气象”,而连结二者的纽带之一即为“丝绸之路”^③。这一交通动脉经过汉代以来的不断延展,

发展到盛唐更是显现出空前的繁荣,由长安经西域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使得“盛唐气象”在空间上获得绝佳诠释。“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表现出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盛,而且唤起了唐代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希望。”^[2] 行走于

^① 参见胡大浚、马兰州《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张晓明《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杨晓霭、高震《21世纪边塞诗研究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盛唐边塞诗派”提出质疑的相关文章中,较为典型的有孟二冬《“盛唐边塞诗派”质疑》,《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该文认为将盛唐时期高、岑等人作为代表以写边塞题材而著称的一批诗人命名为“边塞诗派”欠妥,其理由之一是“这不仅容易使人们忽视高、岑等人其他题材的诗歌,也容易使人们忽视其他人的边塞诗歌。高、岑的边塞诗堪称杰作,但王维、李、杜等人的边塞诗,也未尝不可以称为绝唱。”另戴伟华《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该文认为高、岑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且真正属于边地幕府中的士人屈指可数,文士入幕取决于作者的个性、品格,由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的现象,因此不存在盛唐“边塞诗派”。

^③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一书中提出,之后由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将这一名词的涵义进一步延伸。参看杨秀清《华戎交汇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丝绸之路,并以其丝路之作来体现“盛唐气象”的诗人当首推岑参,“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是岑参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壮举”^{[3][P211]}。

一、两次西域行旅的时间及路线

岑参现存诗歌 388 目,计 409 首,^①其中两次西域之行的“丝路”之作约 78 首(其中第一次西域行旅之作 34 首,第二次为 44 首),^②占 19%。在其今存诗歌总数中,“丝路”之作所占比重近五分之一,正是这五分之一成就了岑参这一著名的边塞诗人。关于岑参的生年说法颇多,^③但是各家针对其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说法较为一致,只是在具体月份上稍存差异而已。现以岑参两次西行相关诗作为线索,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对其行旅时间、路线予以考察。

1. 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天宝十载(751)夏,安西之行

天宝八载(749),岑参由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转右威卫录事参军,赴安西都护府高仙芝幕任判官,开始其人生首次西域之行。安西都护府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旧址在今吐鲁番以西之交河古城;高宗显庆三年(658)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府复为西州。”^{[4][P1647]}龟兹即今新疆库车。“安西都护府(今库车)则唐代前期中央政府控制西域之总部。其间(按:凉州至安西都护府)相去五千里,有通道达,为唐代西通西域中亚之交通孔道,亦唐代前期控制西域中亚之工具也。故此道允为当时国际交通之第一重要路线,全程皆置驿。……其间(按:长安至安西都护府)行程七千里,急行一月可达”^{[5][P421]}。

长安到安西属“丝绸之路”东段,岑参首次“丝路”之行期间创作数量虽不及第二次西行,但是根据这 34 首诗可以清晰还原其西旅轨迹,且较第二次“丝路”之作为详。诗人由京师出发一路向西,“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朝发咸阳,暮至陇山,驿站之多、驿骑之速,可窥盛唐交通之发达。陇头分水岭上有“分水驿”,岑参有伤行役之作《经陇头分水》,借眼前之陇水写羁旅之愁肠即作于此地。过陇水,经渭州睹“渭水东流去”(《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一路西向复生思乡

之怀。《题金城临河驿楼》作于金城,即今兰州,乃丝路重镇之一。由金城西北行入河西走廊,“燕支山西酒泉道”(《过燕支寄杜位》),“燕支山”即“焉支山”在今张掖山丹县。过此山则西为酒泉,再向西为敦煌,岑参有《敦煌太守后庭歌》。出敦煌,诗人有《日没贺延碛作》等,“贺延碛”当为“莫贺延碛”,乃伊州境内之大漠,延袤两千里,水草不生,故有“平沙万里绝人烟”(《碛中作》)之说。过大漠,“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经火山》),“蒲昌”为今新疆鄯善,唐为西州所辖,火山高耸蒲昌之东。经火山向西,继有《银山碛西馆》、《题铁门关楼》、《宿铁关西馆》、《安西馆中思长安》之作,可见继银山碛、铁门关后终达安西。“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安西馆中思长安》)由“东风”推测岑参至安西之时当为天宝九载春。之后诗人又有焉耆之行《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阳关之行“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寄宇文判官》)、玉门关之行“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玉关寄长安李主簿》),由“二年”、“岁除”推测岑参当作于天宝九载(750)岁末。“首蓂峰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题首蓂峰寄家人》)根据岑参行迹,“立春”上接“岁除”,时当为天宝十载春东归途中作。暮春至武威作《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河西春暮忆秦中》、《登凉州尹台寺》等诗。岑参留武威时间较长,由《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中“五月”可见其滞留至夏,六月达临洮有《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临洮客舍留别祁四》等诗。

“三年绝乡信”(《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岑参

① 廖劭笺注《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以下简称“廖著”。

② 刘开扬笺注《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 1995 年版,以下简称“刘著”。本文论述岑参两次西域行旅的时间以刘著为据,参以廖著作为补充。文中采用岑诗均引自刘著,诗歌系年亦本该书。

③ 因岑参与杜甫同年去世,皆为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故其卒年未有异议。关于其生年争议颇多,较早有赖义辉《岑参年谱》(《岭南学报》1930 年 1 卷 1 期)的“唐玄宗开元六年”说,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1957 年 10 月 6 日《光明日报》)“开元二年”说,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南京师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开元五年”说,关于以上诸说及辨证详见廖著《岑参年谱》。而影响较大的有“开元四年(716)”说,主此说者为刘开扬,详见其《岑参年谱》;“开元三年(715)”说,主此说者首推闻一多,详见其《岑嘉州系年考证》(收入氏著《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廖著《岑参年谱》赞同此说,另有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后附《文学史年表》涉及岑参生卒年亦采此说。

初使西域为幕僚前后近三年时间,其“丝路”之作反映出的行经之处与严耕望所考唐长安通往西域的大道完全相符,“岑参由长安逾陇坂,大震关,分水驿,经渭州,临州,兰州,至凉州,又经肃州,玉门关,渡莫贺延碛至西州,亦曾到沙州;西州又西经银山,焉耆,铁门关,至安西。”^{[5] [P426]}此正为唐代“丝绸之路”中道之东段。

2.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夏——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夏,北庭之行

(天宝十三载三月)乙丑,左羽林上将军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4] [P228]}。“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长安二年(702)为北庭大都护府。”^{[6] [P1047]}岑参首次西域行旅时,封常清与之同为高仙芝幕僚,封常清天宝十一载为安西副大都护,十三载因军功再居显位。同年四月岑参受封常清辟为北庭节度判官,遂发京师赴北庭(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开始其第二次西域之行。

岑参第二次西旅之作约44首,抵达北庭前所作仅有6首,远不能与首次西行到达安西前所作数量(约16首)相比。根据这6首可知岑参途经陇山,诗写“陇山鹦鹉能言语”(《赴北庭度陇思家》),经临洮作《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复经凉州有《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过酒泉忆杜陵别业》),再由酒泉道向西过莫贺延碛,有《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一诗。观岑诗中所写此段行程虽不够详尽,但与首次赴安西路线亦合。然而继《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之作后即为《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后者乃北庭所作。由碛西到北庭,其间路途未有所作,大致推测诗人由碛西经伊州,再西北向北庭进发,于是年夏末或秋初至北庭。九月封常清西征,岑有《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二名篇相赠。冬日,封破播仙凯旋,有《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天宝十四载春诗人自言“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北庭作》);三月出使轮台,作《轮台即事》。归北庭后相继作有《北庭贻宗学士道别》、《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陪封大夫宴瀚海亭纳凉》、《奉陪封大夫宴》,八月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九月重阳作《奉陪封大夫九

日登高》一诗,是月又有《赵将军歌》。随之出使交河郡有《使交河郡》、《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送崔子还京》,冬作《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十二月封常清、高仙芝因战败先后被斩于潼关,至德元载(756)岑作《送张都尉东归》自注“时封大夫初得罪”,且言“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送四镇薛侍御东归》)于轮台别友,作《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春日于北庭作《优钵罗花歌》、《使院中新栽柏树子呈李十五栖筠》等。孟秋至轮台,自言“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首秋轮台》),冬日于玉门关作《玉门关盖将军歌》。至酒泉有《赠酒泉韩太守》、《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属东归途中作。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幸凤翔,岑参后亦至凤翔。

至此岑参人生中的两次西域行旅结束,但其“丝路”之作的深远影响方开端倪。在流传至今的唐代两千余诗人近五万首诗歌中,唯有在岑参笔下将“丝路”之行完整再现,这是岑参之幸,亦是唐诗之幸。

二、对于“丝路”之作内容的丰富与开拓

岑参的边塞诗歌均为亲历边地之作,真情实景的描写与抒发更能够表现其边塞诗作悲壮奇丽的风格。岑参第二次西域行旅的“丝路”之作无论数量抑或质量都较首次西行创作为胜,尤其是第二次西行创作中的绝大部分诗歌为到达北庭后所作,且二次西行时间较首次为久,故后一时期的“丝路”之作对西域边地的描写更为丰富独特,创作手法的不断成熟使得风格渐趋成熟,慷慨激昂的创作心理明显反映于创作实践中,体现为诗作中的悲壮与奇丽。此并非强调岑参首次西行之作水平不高,其初使西域之作同样是唐代边塞诗中的优秀篇章;只是在初次西域行旅创作的对比之下,二次西行所作更能反映岑参对诗歌创作的有心探索,诗境的开拓正是通过前后对比体现出来。

岑参两次西行过程中的“丝路”之作对边塞诗,乃至对唐诗内容的丰富与开拓不单表现为战争主题的提升,更主要体现在对“丝路”文化、异域风情的多重呈现。后一主题正是因岑参的亲历西域方才体现于边塞诗中,进而使得边塞诗所表现

的主题益加多样丰富;同时正是后一主题呈现更突显出岑参边塞诗“奇丽”的风格。两次西域行旅对边地异域景物人事的呈现,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自然景观

“丝路”之行,一路陪伴岑参的唯有日月。“月”在诗人笔下共出现18次,这一自然意象不仅记录着诗人的“丝路”行迹,亦是其心路历程的符号与象征,如陇山“山口月”、敦煌“城头月”、凉州“城头月”、武威“边城月”、北庭“东楼月”、“轮台月”,以及“汉月”、“边月”无一不折射出对“故园月”的怀念。不仅是月,“日”(11次)亦被赋予这一涵义。尤其是在岑参第一次西旅,笔下之“日”多与长安相联系,“长安遥在日光边”(《过燕支寄杜位》)、“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安西馆中思长安》)、“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忆长安曲二章寄庞催》),长安即故乡所在,由情及物,物亦着观者之情。

西旅所经不仅是山川河流,越向西,展现眼前更多的是戈壁大漠。岑参两次西行对沙漠描写极多,首次西行第一首诗便开始对其有所描写,“十日过沙碛”(《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可见其广袤,尤其当诗人出敦煌亲历莫贺延碛时,无垠的大漠令人绝望,乃至发出“悔向万里来”(《日没贺延碛作》)的感叹。作为万里沙碛的标志性植被,“白草”在岑参“丝路”之作中出现多达10次,然而诗中“白草”并非作为沙碛大漠的代名词,这一物象在诗人笔下巧妙表现了另一重涵义,即沙碛的广袤。“白草磨天涯”(《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白草通疏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白草北连天”(《过酒泉忆杜陵别业》)、“千山万碛皆白草”(《赠酒泉韩太守》)等,正是在岑参笔下使“白草”成为边塞诗特有的意象。白草、白雪似乎为西域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然而岑参笔下的“梨花”又为这神秘增添了几分生机。“梨花”在诗人笔下共出现三次,前两次均为实写“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河西春暮忆秦中》)、“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登凉州尹台寺》),这两首诗皆作于第一次西行途中;第三次写“梨花”为虚写,“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梨花之繁喻

雪花之盛,设喻之奇妙为历来所称许。第二次“丝路”之作所体现出的奇丽风格经“梨花”的妙用得升华,然而没有首次西行的“梨花”印象,没有亲历边塞的体验,此等奇景奇语是不可能出现在岑参笔下的。此外还有《优钵罗花歌》描绘了一种“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独生长于西域的奇花,虽为借物抒怀之作,同样折射出异域自然风光之瑰丽。

边地气候温差极大,岑参不仅写严寒亦写酷暑,这主要通过“火山”予以表现。岑参首次见到火山系第一次西行,“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经火山》),时维严冬,然而却是“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乃至“人马尽汗流”,诗人亦由衷感叹造化之功。第二次西行于五月盛夏复经火山,“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后作《使交城郡》第三次写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诗人久在边地却三次着墨火山,两次形容其“突兀”,山之高、山之奇尽显笔端,亦见异域自然风光的奇丽。

2. 异域风俗

边地虽有征战却并非处处苦寒,“丝路”之上不乏安定、富庶之地,只是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出了别样的异域文化。由岑参首次西旅对敦煌的描写可见“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太守后庭歌》),边地小郡虽不比中原,但“郡中无事”,百姓安居;再如“凉州七里十万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更是写出了“丝路”东段重镇凉州的繁华。即使在更为遥远的北庭,诗人亦有“胡地首蓿美,轮台征马肥”(《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的赞颂,轮台县属北庭,“其俗帐居,随逐水草。帐门皆向东开门,向慕皇风也”^[7],岑诗描写该地“囊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以及“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臃”(《首秋轮台》)正应史载。累累帐房、连连驼队折射出盛唐西域的繁荣与“丝路”的富庶。

边地民族多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军旅生涯中“马”更为主力。岑参笔下“马”这一物象使用频率极高,78首“丝路”之作中凡见44次,即每两首诗中“马”至少出现一次。但岑诗中的“马”并非只作为战争意象出现,诗人借“马”有写相思赠别之意,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匹马西从天外归”(《送崔子还京》)，“送君走马归京师”(《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有抒建功立业之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描写战争之激烈“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其四》)，“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其六》)；以及羁旅之岁长“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碛中作》)，“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安西馆中思长安》)。此外诗人写边地之苦寒以衬托羁旅之辛苦亦是借助“马”这一物象，“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进人面”(《银山碛西馆》)，“马毛带雪汗气蒸”(《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城南猎马缩寒毛”(《赵将军歌》)，“马汗踏成泥”(《宿铁关西馆》)，“秋冰鸣马蹄”(《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胡沙费马蹄”(《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沙口石冻马蹄脱”(《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出塞马蹄穿”(《送张都尉东归》)。通过对“马毛”(3次)、“马汗”(3次)、“马蹄”(6次)的描写，细处着眼却营造出极强的艺术效果。

岑参身处西域，边地民族自然为其诗作所反映，“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轮台即事》)，“侧闻阴山胡儿语”(《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羌儿胡雏齐唱歌”(《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西域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普遍性演化为了—种风俗，在岑参笔下的军幕生活中尤多体现“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奉陪封大夫宴》)，“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美人舞如莲花旋”(《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军中生涯不仅是“角声—动胡天晓”(《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之后的“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及“鸣笳叠鼓拥回军”(《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其三》)，军乐之外的宴飨之乐实为沙场之外的主旋律。尤其是胡歌、胡乐、胡妓、胡舞交相辉映的纷繁场景为“醉争酒盏相喧呼”(《玉门关盖将军歌》)，“浑炙犁牛烹野馐”(《酒泉太守席

上醉后作》)宴饮气氛的描绘增添无限生趣，极大地拓展与丰富了岑参“丝路”创作的内涵艺术。

3. 边地人物

往来于塞外边地，岑参交往最多乃是下层幕僚，相近的身份与境遇使他们心灵的沟通有了更多默契。往返奔走于“丝路”之上的这一群体，赠答中的寄托与勉励成为“丝路”上的又一主题。《玉关寄长安李主簿》、《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送韦侍御先归京》、《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北庭贻宗学士道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送张都尉东归》等等，不同的酬赠对象却抒写着相同的送别主题。“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时来整六翮，—举凌苍穹”(《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豁达的勉励亦无法掩盖羁旅的相思愁苦与仕途的坎坷辛酸，“相忆不可见，别来头已斑”(《寄宇文判官》)，“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其实后者正是由来已久的边塞诗歌主题之一，岑参的成功之处不在于继承这一主题，更在于对这一主题的深化，“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苦境之中犹能发旷达之语，悲壮之余更见慷慨。

边地的安定离不开地方官员的勤政，作为幕僚文士的岑参在其两次“丝路”之作中就有对地方官惠政的记录“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敦煌太守后庭歌》)，边地郡守如此贤能，以至于在其离任时百姓“愿留太守更五年”。同样被称颂的还有酒泉太守，“太守有能政，遥闻如古人”(《赠酒泉韩太守》)，以及地位并不高的郭司马，“不倚将军势，皆称司马贤”(《送郭司马赴伊吾郡请示李明府》)。武将之中被称颂的有玉门关盖将军，“盖将军，真丈夫……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玉门关盖将军歌》)，以及多次被岑参歌颂的幕主封常清，“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岑参的边塞诗作具有悲壮的风格，但这一风格并非体现为杀伐征战。检阅岑参两次边塞行旅相关诗作不乏对战争的描写，但突破了以往边塞诗将战事作为创作主题，更没有对穷兵黩武的颂扬，这是岑参“丝路”之作的可贵之处，从其歌颂对

象中亦可窥岑参的政治理想。无论汉将、蕃王在其笔下均显得分外融洽,“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胡歌》),“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数语之间个性彰明。“丝路”之上民族的多样与交融经岑参西行之作得以体现,进而为“盛唐气象”注入了异域气息。

三、关于“丝路”之作体裁的探索与创新

在岑参两次西域之行约 78 首“丝路”创作中,前后体裁的差异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诗人在艺术境界上的开拓。现以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对岑诗的分类为依据,将其前后两次西域行旅创作的体裁分类列表如下:

创作数量(首)	诗歌体裁						总计
	五绝	五律	五古	七绝	七律	七古	
第一次西域行旅 33 目 34 首	5	11	6	8	0	4	72 目
第二次西域行旅 39 目 44 首	2	16	4	10	0	12	
		22			22		78 首

岑参第二次西域行旅创作与前一次相比五言(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古诗)诗歌创作数量基本持平,而七言诗歌(七言绝句、七言古诗)创作则比第一次西行创作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七言古诗的数量为前一次的三倍。戴伟华先生曾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对唐以前边塞诗进行统计,将所得结论分为四个方面,其中就诗题分析而言,多为乐府诗,使用最多的是《从军行》(30首)、《陇头水》(20首)、《关山月》(16首);就诗体分析而言,以五言居多,达 144 首,而以七言为主的杂言只有 13 首。^[7]诗歌创作某一体裁数量的上升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作者在该类体裁的艺术探索,而岑参第二次西域之行的“丝路”创作也恰通过其七言诗数量的大幅增加予以体现,尤其是七言歌行、绝句创作数量的增加、水平的提升,成为岑参第二次“丝路”之作的特色,直接反映了岑参对诗歌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努力探索与成功尝试。

岑参在第二次西域行旅的创作中,针对诗歌体裁形式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与创新集中体现为对七言歌行体、七言绝句音乐性的重视与发扬。一方面,岑参继承并发扬七言歌行体的传统,将两次“丝路”之作进行对比,发扬创新的特点较继承体现得更为明显;大胆尝试并创新新题乐府,将七言歌行与边地风光实现了完美结合。在首次出使西域的创作中,岑诗中以“歌”命名的仅有两首,分别是《敦煌太守后庭歌》、《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且皆为七言歌行体。到第二次西域之行七言诗则达到 14 首,其中七言歌行 6 首《火山云歌

送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优钵罗花歌》、《玉门关盖将军歌》等;七言绝句 8 首《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赵将军歌》、《胡歌》。娴熟运用中表现出艺术水平的臻于成熟,可见是诗人的有意尝试。七言较五言更能体现出诗歌丰富的音节变化,其本身的抑扬顿挫加之岑参的有意探索,句句用韵、数句转韵等手法的运用,急节多变的特点更能突显其边塞诗风的遒劲悲壮,作品的艺术个性亦更加鲜明。

另一方面,第二次“丝路”之作中的七言歌行创立了“……歌/行,(奉)送……”的新形式,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这是岑参在诗歌艺术形式上的创举,因为第一次西行创作中并未出现这一体式,甚至在岑参第二次“丝路”创作后,也再没留下采用这一形式的诗歌。正是岑诗中这一“空前绝后”的诗歌形式成就了第二次“丝路”创作的成功与精彩。

四、结语

岑参先后两次西行入幕,以其亲历边地所见之真情实景创作边塞诗歌。在记录“丝路”之行的过程中反映西域风光、歌颂异域人情,极大拓展并丰富了边塞诗的表现内涵。同时在诗歌题材上继承发扬七言歌行、绝句的音乐性,尤其在边塞诗创作中对七言歌行体的用心探索与成功运用,以新题乐府入边塞之作,并且创立了(下转第 22 页)

索”即如是。“词乐”此处之“弦索”，所指为前者。这一记载表明，李开先对于弦类乐器的特点与演奏技法，乃是相当熟悉的，因之才有“使轻重疾徐不至差错”、“清弹亦然”等经验之谈，而“轻重徐疾”则是与“知音十标准”中“知节拍、指点”，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的。最后的“今世能兼擅者，实难其人”两句，所反映的虽然是李开先对当时无弦索名家的一种焦虑，但其对整个明代乐坛的关注，以及于乐器演奏在舞台中作用的认识等，亦皆寓其中。

《词谑》作为明代初、中期之际的一部自成体系的戏曲论著，无论是其中的“词谑”、“词套”之所述，抑或“词乐”、“词尾”之所载，综而观之，都

是可视之为李开先晚年眷恋北曲的一份重要记录的。因之，《词谑》不仅具有较为重要的戏曲学史料价值，而且也极具文学史料学的认识价值。在《市井艳词又序》一文中，李开先曾如是写道：“予独无他长，长于词，岁久愈长于俗。远交王谿陵，近交袁西野，足以资而忘世，乐而忘老。三日不编词则心烦，不闻乐则耳聩，不观舞则目瞽，此康乐山之托言，予之事实也。”^{[2][P5]} 其中的“三日不编词则心烦，不闻乐则耳聩，不观舞则目瞽”云云，是李开先终年与北曲打交道的最好见证。正因此，使得他成就了这部在明代戏曲论著史上占有较重要地位的《词谑》。所以，《词谑》中的种种记录与种种评论，均给后世戏曲评论家以有益之启示。

参考文献：

- [1] 李开先. 李中麓闲居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41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 李开先. 词谑(词套)[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三集).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3]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谢灵运. 谢灵运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 [5] 王季思. 西厢五剧注[M]. 杭州: 浙江龙吟书屋, 1944.
- [6] 徐渭. 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三集).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责任编辑 安正发]

(上接第15页)“……歌/行,(奉)送……”的歌词新体式,是对边塞体裁探索的成功践行,实现了唐诗创作中边塞题材与体裁形式的完美结合与诠释。此外,岑参奇丽、悲壮的创作风格体现在其边塞诗中对景物人事的描写,则分别对应为优美与

崇高。也正是在这两个美学范畴上的并力探索,使岑参不仅成为盛唐诗人中边塞诗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丝路”之行上的“丝路”之作亦将其推向边塞诗歌这一峻岭之艺术巅峰。

参考文献：

- [1] 严羽(著) 郭绍虞(校释). 沧浪诗话校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2] 李明伟. 丝绸之路与唐诗的繁荣[J]. 中州学刊, 1988(6).
- [3] 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 第二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4] 刘昉,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 1985.
- [6] 欧阳修, 宋祁, 等.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7] 戴伟华. 论岑参边塞诗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J]. 文学遗产, 1997(4).

[责任编辑 安正发]